

陇右文化研究丛书

主 编 雍际春 副主编 霍志军

SHENGTANGSHIRENQIUSHI HUODONGYUWENXU



盛唐士人求仕活动与文学

以关陇地区为中心

霍志军 安涛◆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013045945

陇右文化研究丛刊

I206.2

132

主 编 雍际春 副主编 霍志军

SHENGTANGSHIRENQIUSHIHUODO



盛唐士人求仕活动与文学

以关陇地区为中心



霍志军 安涛◆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北航

C1654177

I206.2

132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盛唐士人求仕活动与文学：以关陇地区为中心 / 霍志军、
安涛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4

ISBN 978 - 7 - 5161 - 2352 - 2

I. ①盛… II. ①霍…②安… III. ①社会活动—关系—
文学研究—中国—唐代 IV. ①I206.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61288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张 林
特约编辑 金 沛
责任校对 韩海超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 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3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8.25
插 页 2
字 数 301 千字
定 价 5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 - 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总 序

大千世界，万象竞呈。因区域自然和人文社会环境的差异性，在中国广袤无垠的土地上孕育了丰富多彩的地域文化，彰显着各地人们的文化气质。燕赵、齐鲁、巴蜀、三秦、荆楚、吴越等文化已广为人知。这其中，陇右文化更是因其所处的农牧交错、华戎交汇与南北过渡的区位优势，成为我国地域文化百花园中绽放的一朵奇葩，具有迷人的风采，散发着瑰丽的芬芳。

陇右文化源远流长。若从原始人类遗迹来看，从陇东华池县赵家岔、辛家沟和泾川大岭上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早期石器，到旧石器时代晚期距今3.8万年前的“武山人”遗迹的发现，已昭示着陇右远古文化的曙光即将来临。进入新石器时代，以天水地区大地湾、西山坪、师赵村等遗址为代表的新石器早期遗存，翻开了陇右文化源头的第一页。继之而起的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等文化类型，在多样化农业起源与牧业起源，中国最早的彩陶与地画、文字刻画符号、宫殿式建筑、水泥的发现，最早的冶金术和铜刀、铜镜与金器的出土，礼仪中心的出现，表明等级身份的特殊器具玉器的发现，贫富分化与金字塔式的社会等级的出现等，这一系列与文明起源相关的物质与精神文化成就，既为中华文明起源与形成提供了佐证、增添了异彩，也是黄河上游地区开始迈入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在齐家文化之后的夏商之际，西戎氐羌部族广泛活动于陇右地区，并与中原农耕文化保持频繁的接触与交流，开创了农耕与草原文化相互介入、渗透和交融创新的文明模式。与此同时，周人起于陇东，秦人西迁并兴起于天水，陇右成为周秦早期文化的诞生地，并奠定了陇右以华戎交汇、农牧

结合为特征的第一抹文化底色。自秦汉至于明清，陇右地区民族交融不断，中西交流不绝，在悠久的历史积淀中形成了兼容并蓄、多元互补、尚武刚毅、生生不息的地域文化特质。这种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元素，成为华夏文化中最具活力的基因和重要组成部分，在华夏文明的传承中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然而，在国内各地域文化研究如火如荼、成果层出不穷，地域文化与旅游开发日益升温的形势下，陇右文化的研究却相对冷寂，只是在近年来才引起人们的重视。这其中，天水师范学院陇右文化研究中心的同仁们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2001年，在学校领导的支持和学校陇右文化研究爱好者共同努力下，国内唯一的陇右地域文化研究学术机构——陇右文化研究中心成立。中心以开放的管理方式，以学校内部的学术力量为基础，广泛联系省内外的科研院所和相关文博专家，同气相求，共同承担起陇右文化学术研究和文化旅游资源开发的重任。以期中心的研究成果庶几能为甘肃区域经济社会和文化事业的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和决策参考。

中心成立至今，已经走过了12个春秋。12年里，我校的陇右文化研究与学科建设取得长足的进步。一是通过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初步构建了陇右文化的学科体系和课程体系，为陇右文化研究和知识普及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二是催生和形成了一个省级重点学科，将科研团队建设与人才培养有机结合，使陇右文化研究工作迈上可持续发展有了基础保障。三是2010年中心被确定为甘肃省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为陇右文化学科建设与科学研究搭建了平台。四是汇聚和成长起一支富有既充满活力又富有潜力的学术队伍。五是通过在《天水师范学院学报》长期开办“陇右文化研究”名牌栏目，编印《陇右文化论丛》连续出版物和出版天水师范学院“陇右文化研究丛书”，为研究和宣传陇右文化营造了一块探索交流的学术阵地。在此基础上，产生一批高质量的科研成果，在推进学科建设，服务甘肃文化大省建设，促进区域经济社会文化事业的发展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在2010年，学校为了进一步加大对陇右文化学科建设与科学研究的扶持力度，将陇右文化重点学科建设作为重大项目，申报中央财政支持地方高校专项经费，并得到资助，这为陇右文化研究基地的建设与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经费保障。由此我们研究条件大为改善，先后启动了项目研究、

著作出版和资料购置等计划。现在展现在读者面前的这套“陇右文化研究丛书”，即是著作出版计划的一部分。我们深知，陇右文化内涵丰富，博大精深，但许多领域的研究几近空白，基础研究工作亟待加强。所以，对于“丛书”的编写，我们秉持创新的理念，科学的精神，求实的态度，提倡作者以陇右地域文化为研究范围，立足各自的研究领域和学术特长，自拟选题自由探讨。只要有所创新，成一家之言，不限题材和篇幅，经申报评审获得立项后，即可入编“丛书”。

经过各位作者一年多的辛勤努力和创造性劳动，“丛书”按计划已基本完成。入编“丛书”的著作，涉及陇右文化研究的各方面，主要包括始祖文化、关陇文化、陇右文学、杜甫陇右诗、陇右旅游文化、陇右石窟艺术、陇右史地、陇右方言和放马滩木板地图等主题。各书的作者均是从事陇右文化研究和学科建设的骨干，其中既有多年从事陇右文化研究的知名学者，也有近年来成长起来的中青年才俊。因此，“丛书”的出版，无疑是我校陇右文化研究与学科建设最新进展与成果的一次整体亮相；也必将对深化陇右文化的研究产生积极的影响。我们深知学海无涯，探索永无止境，“丛书”所展示的成果也只是作者在陇右文化研究探索道路上的阶段性总结，可能还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与欠缺。作为引玉之砖，我们希望并欢迎学界同仁和读者多提批评指导意见，激励我们做得更好，以推动陇右文化研究不断走向深入。

“丛书”出版之际，正值甘肃省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启动实施之时。这一发展战略确定了围绕“一带”，建设“三区”，打造“十三板块”（简称“1313工程”）的工作布局。“一带”就是丝绸之路文化发展带；“三区”为以始祖文化为核心的陇东南文化历史区、以敦煌文化为核心的河西走廊文化生态区和以黄河文化为核心的兰州都市圈文化产业区；“十三板块”即十三类文化发展与资源保护开发工作，分别为文物保护、大遗址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利用、民族文化遗产、古籍整理出版、红色文化弘扬、城乡文化一体化发展、文化与旅游深度融合、文化产业发展、文化品牌打造、文化队伍建设、节庆赛事会展举办等。这一战略以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为平台，对加快甘肃文化大省建设，探索一条在经济欠发达但文化资源富集的地区实现科学发展的新路子，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由此可见，甘肃省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战略及其实施重点，也就是我们陇右文化研究与学科建设的主旨所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文化传承与服务社会是高校所肩负的神圣职责。甘肃省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战略的实施，为高校与地方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深度融合提供了契机，也为我院陇右文化研究学科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我们将以此为新的起点，充分利用陇右文化研究基地这一平台，发挥人才和学术优势，积极参与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为甘肃省文化大省建设和文化产业的发展建言献策、奉献智慧。我们相信，我校的陇右文化研究与学科建设，无疑在这一战略实施中大显身手，发挥排头兵的作用；也必将在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战略的实施中进一步深化合作，不断提升服务社会的能力，并开拓新的发展空间和学科生长点。

祝愿本套丛书的出版为甘肃省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增光添彩！

雍际春

2013年春于天水师范学院陇右文化研究中心

目 录

绪论	(1)
第一节 “关陇”概念的界定	(1)
第二节 唐代关陇方土风气	(3)
第三节 求仕:盛唐诗人的人生寄托	(6)
第四节 唐代文学研究中一个有待开拓和深化的领域	(11)
 第一章 功业意识和主体精神——开天之际士阶层的	
人生价值取向	(13)
第一节 士林风尚	(13)
第二节 人生价值取向产生的社会历史文化渊源	(17)
 第二章 文学精神	(40)
第一节 昂扬奋发的进取精神	(40)
第二节 张扬自我的主体精神	(49)
 第三章 求仕活动与盛唐士人的文化心态	(55)
第一节 初到关陇时的用世心态	(55)
第二节 求仕过程中的迷茫焦虑心态	(65)
第三节 初入仕途的春风得意心态	(70)
第四节 求仕失败后的失意苦闷心态	(72)
第五节 求仕心态与求仕失败	(77)

第四章 盛唐士人求仕活动与文学创作的个案研究	(81)
第一节 “太白精神”与李白求仕	(82)
第二节 “杜甫精神”与杜甫求仕	(97)
第三节 王维:从内儒外佛到外儒内佛	(130)
第四节 孟浩然:盛唐求仕热潮中的“多余人”	(136)
第五节 高适:一生徒羡鱼、四十犹聚萤	(147)
第六节 岑参:出入两京、落第布衣	(154)
第五章 求仕活动及盛唐士人的性情分野	(166)
第一节 执着坚毅的人生追求	(166)
第二节 镇定自若的人生哲学	(171)
第三节 柳暗花明的人生转折	(174)
第四节 求仕不果的愤慨	(182)
第六章 盛唐士人求仕活动中的文学创作	(188)
第一节 文人送别诗	(188)
第二节 文人游宴诗	(191)
第三节 干谒诗文	(196)
第七章 求仕活动与盛唐士人的审美理想	(207)
第一节 风格特色	(208)
第二节 艺术表现	(218)
参考文献	(235)
附录表一:盛唐关陇地区求仕的诗人创作统计表	(239)
附录表二:盛唐关陇地区求仕的诗人创作编年表	(242)
后记	(280)

绪 论

第一节 “关陇”概念的界定

“关陇”是一个历史地理概念，大体包括关中、陇右两个区域。《史记·货殖列传》云：“关中自汧、雍以至天水、陇西……故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① 汉代所谓的关中，其实即指今陕西及甘肃东部地区。关中概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其指意不尽相同，范围广狭亦有区别，这种区别当与秦国在统一战争中迅速扩张，疆域迅速扩大的历史过程有关，是一种“大关中”概念。^② 唐代所谓的关中，大致指今陕西三秦地区，如包括“陇右”时，一般则改用“关陇”以示区别。

“陇右”作为地域概念，最早约出现于东汉末魏初，在《三国志》中“陇右”一词已频繁出现。溯其渊源，“陇右”一词则由陕甘界山的陇山而得名。众所周知，古人地理概念以西为右，以东为左，如“江东”亦称“江左”，故称陇山以西的广大地区为“陇右”。唐太宗贞观元年（627年），分全国为十道，以东起陇山，西达沙洲的地域始设陇右道。《旧唐书·地理志》云：“自隋季丧乱，群盗初附，权置州郡，倍于开皇、大业之间。贞观元年，悉令并省。始于山河形便，分为十道：一曰关内道，二曰河南道，三曰河东道，四曰河北道，五曰山南道，六曰陇右道，七曰淮南道，八曰江南道，九曰剑南道，十曰岭南道。至十三年定簿，凡州府三百五十八，县一千五百五十一。至十四年平高昌，又增二州六县。自北殄突厥颉利，西平高昌，北逾阴山，西抵大漠。其地东极海，西至焉耆，南

① （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261页。（以下版本号略）

② 参见王子今《秦汉区域地理学的“大关中”概念》，《人文杂志》2003年第1期。

尽林州南境，北接薛延陀界。凡东西九千五百一十里，南北万六千九百一十八里。”^①《新唐书·地理志四》云：“陇右道，盖古雍、梁二州之境，汉天水、武都、陇西、金城、武威、张掖、酒泉、敦煌等郡，总为鹑首分。为州十九，都护府二，县六十。”^②这样，陇右即由原先的地域概念而为行政区域划分了。唐睿宗景云二年，以黄河为界东设陇右道，黄河以西地域设河西道。

20世纪40年代，陈寅恪先生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一书中提出“关陇集团”概念：“宇文（泰）苟欲抗衡高氏（欢）及萧梁，除整军务农、力图富强等充实物质政策外，必应有精神上独立自成一系统之文化政策，其作用既能文饰辅助其物质即整军务农政策之进行，更可以维系其关陇境内之胡汉诸族之人心，使其融合成为一家，以关陇地域为本位之坚固团体。此种文化本位政策，范围颇广，包括甚众，要言之，既阳傅周礼经典制度之文，阴适关陇胡汉现状之实而已。”^③1941年，他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篇“统治阶级之氏族及其升降”中又进一步阐发“关陇集团”概念：

有唐一代三百年间其统治阶级之变迁升降，即是宇文泰“关中本位政策”所鸠合集团之兴衰及其分化。盖宇文泰当日融冶关陇集团胡汉民族之有武力才智者，以创霸业；而隋唐继其遗产，又扩充之。其皇室及佐命大臣大都西魏以来此关陇集团中人物，所谓八大柱国即其代表也。当李唐初期此集团之力量犹未衰损，皇室与其将相大臣几全出于同一系统之阶级，故李氏据帝位，主其轴心，其他诸族入则为相，出则为将，自无文武分途之事，而将相大臣与皇室亦为同类之人，其间更不容别一统治阶级之存在。至于武曌，其氏族本不在西魏以来关陇集团之内，因欲消灭唐室之势力，遂开始施行破坏此集团之工作，如崇尚进士文辞之科破格用人及渐毁之制度等皆是也。此关

①（后晋）刘煦：《旧唐书》卷三八《地理志一》，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384—1385页。（以下版本号略）

②（宋）欧阳修、宋祁等：《新唐书》卷四〇《地理志四》，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039页。（以下版本号略）

③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7页。

陇集团自西魏迄武曌历时即经一百五十年之久，自身本以逐渐衰腐，武氏更加以破坏，遂致分崩堕落不可救止。其后皇位虽复归李氏，至玄宗尤称李唐盛世，然其祖母开始破坏关陇集团之工事竟及其身而告完成矣。^①

关中与陇右山水相依，风俗相近，文化相融，无论是自然还是人文景观都非常相似并有着紧密联系，故又常常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历史上，人们习惯将包括今陕西三秦与甘肃东南部的地域，称为关陇地区。自陈寅恪先生提出“关陇集团”概念以来，“关陇”这一概念，六十多年来被海内外学人广泛引用，本书所用“关陇”概念即源于此。

第二节 唐代关陇方土风气

关陇文化萌芽于新石器时代早期以农耕文明为主的仰韶文化、大地湾文化、中经大地湾中晚期和马家窑文化，至齐家文化时期，由于气候变冷，以西戎、氐、羌为主的畜牧文化代之而起。接着，周人兴起陇东，秦人崛起天水，以农牧并举、华戎交汇为特征的秦文化兴盛起来，奠定了自先秦至隋唐关陇地域文化的基本形态和格局。宋代以来，伴随单一农业经济形态的形成，关陇文化由农牧并举转向农耕文化形态。关陇文化历经千百年来的流变整合和融通积淀，浸润了深深的地域性烙印。它既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又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在唐代，随着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向西北倾斜，关陇地区成为唐王朝最为重视的地域之一，关陇方土风气更具有其独特性。

第一，开放兼容。关陇地区位于青藏高原、内蒙古高原和黄土高原的结合部，在水分、热量和植被等地理因素上属于典型的过渡性自然带，这为关陇地区发展农业、经营畜牧或半农半牧经济的形成提供了可能。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关陇地区成为东西文化交流的桥梁和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因而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碰撞、融合荟萃的舞台和扩散传播的桥梁。中外文化的双向交流互补，既为关陇文化不断注入新鲜血液和异质养料，又在

^①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47页。

域外文化的本土化进程中使关陇文化得到重塑与改造。这种自然、人文环境，使关陇文化具有开放、兼容的优势和极强的渗透性与包容性，从而既促进了关陇文化的发展，又为中华文化源源不断注入活力和新鲜血液。

进入8世纪，唐王朝迎来了鼎盛期，对外交流更加频繁，与七十余国保持着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关系。曾主管鸿胪寺的王忠嗣、贾耽，编著了《西域图》、《海内华夷图》和《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等书籍。根据9世纪阿拉伯人所著的《中国印度见闻录》，中国唐皇帝曾列举出当时世界最显赫的国王有伊拉克王、中国皇帝、突厥王、印度王、罗马国王。其中将阿拉伯帝（伊拉克王）称为“权威最高，耕地最广，物产最富，贤人最多的王国”，可见唐朝对国际情势的掌握。如果说大唐王朝是中国古代最为开放的时期之一，那么，关陇地区则无可辩驳地成为唐王朝开放的前沿地带。多个民族在这里相互杂居、和谐相处。关陇文学是在东西文化、游牧文明与农业文明的撞击中发展壮大起来的。讲经文、变文、诗话、曲子词、话本、传奇、小说、宝卷等俗文学形式亦炽盛繁烈，构成异常多样、繁荣多元的文学生态。多元的文学景观反映的正是关陇地区开放包容的特征、顺时应变的革新精神与兼容并蓄的开放势态。在与外来文化交流时具有一定的渗透性、包容性和适应性，形成关陇文学多元共生的文学接受群体，这样多元的文化生态使得各种文学形式在这里都能找到其合适的土壤。

第二，尚武精神。关陇地区半农半牧的自然环境，多民族杂居的人文环境以及中原王朝与周边部族在关陇一带的争夺与分立，浸润以久，形成陇人粗犷悍厉的尚武性格。先秦时氐、羌、西戎各民族，以游牧骑射和强健勇猛称，秦人崛起关陇后，轻死重义、奖励耕战，不畏艰险、开疆拓土，不但构成秦文化的一大特色，而且对后世有深刻影响，流风余韵、绵延不绝。《汉书·赵充国辛庆忌传》曰：“山西天水、陇西、安定、北地，处势迫近羌胡，民俗修习战备，高尚勇力，鞍马骑射。故《秦诗》曰：‘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①“天水、陇西，山多林木，民以板为室屋。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习战备，高上气

^①（汉）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998页。

力，以射猎为先。”^① 这一文化特征成为关陇地域文化中长期传承和内在积淀的一种文化基因。

处在此种文化区的陇人一旦国家危难或受到侵犯，自然会拔剑而起，挺剑而斗，崇尚武力。“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秦风·无衣》）^② 此诗充满了共御外侮，崇尚武力之气质和豪放开阔之胸怀、无所畏惧之气概，读之令人壮心骤发，气血腾涌。

十六国时期的关陇谣谚民歌反映的多是陇人的尚武气质。“陇上壮士有陈安，身干虽小腹中宽。爱养壮士同心肝，蹶驄父马铁瑕鞍。七尺大刀奋如湍，丈八蛇矛左右盘。十荡十决无当前，百骑俱出如云浮。”（《陇上陈安歌》）^③ 全诗生动形象地塑造了侠风义胆、骁勇善战、勇猛异常的陈安形象，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其中折射的正是陇人崇尚武力、以斩首为勇的文化性格。尚武的文化性格不但在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关陇文学中一再体现出来，在唐代，关陇文化的尚武精神也得到极大拓展与发扬。陇西、天水“于古为六郡之地，其人性犹质直，然尚俭约、习仁义、勤于稼穡，多畜牧，无复寇盗矣”，^④ 尚武性格成为陇人固有的特质基因而积淀于民族性格的深层，这种尚武气质注入唐代文学中，形成唐代文学特有的刚健气质。

第三，唐王朝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关陇地区山川雄奇壮阔，民风淳朴刚强，文化积淀深厚，秦汉唐时期一直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唐王朝实行“关中本位”政策，欲保关中，必守陇右；欲守陇右，必固河西；欲固河西，必斥西域。全国政治、军事中心在关陇地区。据史料记载，唐王朝开元、天宝时期，全国军队约五十余万人，关陇地区驻军约15万人，如果加上安西四镇驻军约有二十万人，占全国的40%。^⑤ 全国有战马约八万匹，关陇地区约有战马三万匹，占全国的三分之一强。《资治通鉴》载，盛唐时期“是时中国盛强，自安远门西尽唐境凡万二千里，

①（汉）班固：《汉书·地理志》，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644页。

② 陈子展：《诗经译注》，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402页。

③ 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781—782页。

④（唐）魏征：《隋书·地理志上》，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816—817页。

⑤ 参见胡大浚主编《陇右文化丛谈》，甘肃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33页。

间阎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① 唐代三百年，关陇地区既是全国政治、军事、经济的中心，同时也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中心。唐代士人由于应试、入仕的原因，大都要到关陇地区居住、游历、任职，与云集关陇地区的众多诗人交流思想，切磋诗艺，参与诗歌创作活动。他们来到关陇之后，视野之开阔，思路之拓展，诗艺之提高，都是空前的。同时，众多士子在关陇一带接触到当时繁华的关陇生活，游览关陇山水田园、远赴边塞求仕，登临名胜古迹，即景抒情，触物起兴，写下了不少诗歌，其中多数是唐诗中的典范作品。如唐代诗人咏慈恩寺的诗作今存五十余首，以杜甫、高适、储光羲、岑参同登此塔的四首诗作至今传颂不衰。可以说，唐代士子在关陇一带的创作，丰富了唐代文学的百花园，是唐代文学发生、发展的一个重要推动力量。

第三节 求仕：盛唐诗人的人生寄托

求仕，也就是求做官，这本来是封建社会里知识分子的共同出路，“学而优则仕”的信条是中国古代士人永恒之理想。但盛唐士人的求仕又有其特点。以门阀制度统治下的两晋南北朝而言，这一时期士阶层的思想层面，其特色是“易、老、庄的三玄之学代替了汉代经学，就士的行为而言，其特色则是突破了传统礼教之藩篱而形成一种‘任诞’的风气”。^② 在此种时代背景下，从政求仕乃世族之特权。他们凭借门荫，便可“平流进取，坐至公卿”。贵族士人虽然参与政治，却并无干一番事业之愿望。反以“遗情世务”或“不亲庶务”为荣。这类记载频见于《世说新语》。《晋书》卷七十《应詹传》曰：“元康以来，贱经尚道，以玄虚宏放为夷达，以儒术清俭为鄙俗。永嘉之弊未必不由此也。”^③ 至于当时的寒士群体，尽管有的怀有一定的政治抱负和政治才干，但在那样的历史条

① （宋）司马光等：《资治通鉴》卷二一六，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2668页。（以下版本号略）

②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57页。

③ （唐）房玄龄：《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858页。

件下，求仕之愿根本不可能付诸实施。左思《咏史》^①就记录了诗人从“铅刀贵一割，梦想骋良图”的壮志出发，经过对“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的现实社会的比较，终于导致“自非攀龙客，何为飀来游”的心路历程。鲍照更是因“才秀人微”而“取湮当代”。他们空有求仕从政之志，难行从政之实。

盛唐文人的求仕，也是中唐以后所不能比拟的。中唐—北宋是我国封建社会由“中古”向“近古”转变的重要历史时期。中唐以后，中国封建社会转入下坡，各种社会矛盾日益激化，内忧外患、藩镇割据、朋党相争、专制主义强化、思想禁锢严密，而且愈到后来愈严重。动辄得咎、贬处蛮荒，这一切必然给文人求仕投下阴影，忧谗畏讥、满目萧然。北宋以降，虽然科举的大门同样为士阶层敞开，取士人数，士人俸禄均有大幅度改善，然士人们始终处于皇权的阴影、政治的旋涡和党争的倾轧中。在这种威逼利诱之下，士阶层纷纷向皇权看齐，士的人格也被严重的异化和扭曲，以至于后来“范进中举”的悲剧不断重演。在这种情况下，虽有部分文人坚持以天下为己任，积极从事政治革新，但更多的士人不由自主地由“兼济”转向“独善”，由江山塞漠遁入案几书斋。“儒道合一”成为新的人生范式，空谈性理为修身治国之本。这样的人仕实际只剩下一个躯壳，而丢失了其灵魂。

相形之下，真正能够将心志与形迹统一起来的，是唐代寒士的求仕活动。他们生长在上升、有为之时代。置身于能动的地位，必然要激起强烈的从政需求。即使遭受阻力，也无碍他们把全部能量释放出来，去奋力追求既定之目标。以求仕为人生第一要务，“天生我材必有用”的振臂一呼响彻整个中国文学史。这跟文人耻谈国事，视议政为畏途，寒士群体缄口难言、取湮当代、与时消没、不闻于世的尴尬局面相较，无疑昭示着一种新的人生态度。

盛唐兴起的求仕热潮，历时达半个世纪之久。文人们几乎无一例外卷入其中。求仕不仅对唐王朝政治，而且对此期士人的人格、生活、审美理想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① 姜书阁、姜逸波选注：《汉魏六朝诗三百首》，岳麓书社1992年版，第172页。（以下版本号略）

盛唐每年集中于关陇的士子，至少逾千人，但能及第的却是极少数。《宋史》卷一五五《选举志》“科目”条云：“唐自贞观迄开元，文章最盛，较艺者虽千余人，而所收无几。”^①对大多数求仕士人而言，等待他们的是仕进无门，落第的悲叹和奔波于道途之辛酸。由于求仕不遇，他们的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即使那些及第者，也仍然要在求仕路上辛苦奔波）。沉重的人生苦难强烈地刺激着士人们高傲上进的心灵，使他们在人生转折的关口，在抗击沉沦的人生旅途中以全身心去拥抱、体验生命的压抑之痛，从而激发出生命的活力，深切地体味人生的苦涩和真谛，也愈益深切地领悟到人生命运、生存意义等文学艺术之真谛。更有甚者，一些伟大的诗人更是从个人不幸中联系到民生疾苦、家国忧患，形成古典文学史上空前绝后的“诗史”、“诗圣”。总而言之，求仕之艰难险阻，不但使他们饱受苦难生活之锤炼和社会生活负面效应的强烈刺激，而且，郁结了他们内心浓得化不开的苦闷情思。构成他们必欲借诗而宣泄痛苦的直接动力和审美之兴奋。所谓“欢愉之辞难工，而愁苦之音要渺”就在于此。

求仕实践真实地记录了一代士子的人生苦难。正如后世文学史家评论指出：“天宝末，刘希夷、王泠然、王昌龄、祖咏、张若虚、张子容、孟浩然、常建、李白、刘慎虚、崔曙、杜甫，虽有文章盛名，皆流落不偶。”^②求仕犹如一道分水岭，一道界碑，求仕也是盛唐士人步入社会、步入人生的第一步。求仕以其内含的封建专制主义、门阀余荫的无比残酷和生命史上的全部痛苦，将求仕士子的人生旅程截为两段：诗化人生和风雨人生。在此之前，他们以功业自许，激情燃烧，纯真浪漫；踏入求仕之路，便犹如历尽炼狱般的烈火煎熬，他们的生命形态亦随之发生巨大逆转，社会以它的残酷和冷漠给这些初入社会的士子当头一棒。这是唐代士子生命的沉沦。“生命的沉沦包含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指生命由高向低的跌落过程，另一个是生命在此过程中遭受的磨难。”^③唐代求仕文人的 人生遭际，无不鲜明地体现了这两个特色：从诗化人生到风雨人生，从激

① （元）脱脱：《宋史》，中华书局 1977 年版，第 3614 页。

② （明）胡应麟：《诗薮》外编卷三《唐上》，上海古籍出版社 1958 年版，第 177 页。

③ 尚永亮：《贬谪与唐诗》，《古典文学知识》2003 年第 1 期。